

香港作家小傳

香港作家聯會編



PORTRAITS OF HONG KONG WRITERS

香
港
作
家
小
傳

香港作家聯會編

香港作家小傳

督 印：香港作家聯會

香港灣仔道 188 號廣生行大廈六字樓 N 室

作 者：香港作家聯會會員作家 110 人

編 輯：《香港作家報》編輯委員會

出版發行：香港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道 188 號廣生行大廈六字樓 N 室

Tel. : 28913443

印 刷：廣東省粵海同心印刷中心

版 次：1996 年 1 月初版

印 數：1000 冊

規 格：大 32 開 (140mm×210mm) 329 頁

國際書號：ISBN 962-8115-01-4

定 價：港幣六十元正

版權所有・不準翻印

目錄

序

王一桃	我的文學道路	(3)
王 方	昨日	(6)
王尚政	走過來的路	(9)
天 涯	我怎樣愛上文學	(12)
巴 桐	灑脫地做人	(15)
文 翱	崎嶇的路	(18)
水禾田	半畝水禾田	(21)
石 貝	我也不知道我是誰	(24)
司徒丙鶴	沉思和期望	(27)
西門丁	自我介紹	(30)
伍美心	自我介紹	(32)
阿 濃	阿濃小傳	(34)
何 紫	自問自答	(36)
何 達	自我介紹	(38)
朱道忠	以詩入樂，以樂興文	(41)
甘豐穗	我的血液成分	(44)
吳 正	愛的泉源兼小傳	(47)
吳羊璧	自我介紹	(50)
吳康民	一段讀和寫的歷史	(53)
吳道子	自我介紹	(56)
吳應廈	忘不了的“夢”	(59)
吳 越	“五線譜”人生	(62)
秀 實	談創作 憶先父	(65)
李遠榮	商余雅好 以文會友	(68)
宋詒瑞	“與大家談談心”或“介紹自己”	(71)
余國康	啓開設計之門 進入童夢的世界	(74)
何絲琳	商文融匯之心路歷程	(76)

阮溪沙	平凡的人生	(80)
林子	緣	(83)
林力安	曾經折翅	(86)
林秋明	文藝伴我走天涯	(89)
林蔭	路依然漫長	(91)
金力明	取向	(94)
金虹	速朽之筆述速朽之人	(97)
金依	自傳	(100)
金東方	自我介紹	(103)
青谷彥	燃燒生命 發揮潛能	(106)
周蜜蜜	自傳	(109)
彥火	昨天的路	(112)
施叔青	小傳	(115)
紅葉	吟詩者言	(117)
韋嫵	小傳	(120)
柯達群	我喜歡天馬行空的生活	(123)
盼耕	沿“邪路”走近文學的人	(125)
馬芳儀	只是筆者	(128)
胡少璋	人生不是夢	(131)
南思	我與文學	(134)
春華	我的生活道路	(137)
胡從經	小傳	(140)
夏易	童年、成長、探索	(143)
夏萍	我的創作之路	(146)
夏婕	珍惜平凡	(149)
夏智定	人生有枝筆相伴是福	(152)
海辛	農村小子做作家	(155)
孫重貴	香港圓了文學夢	(158)
孫滌靈	淺談我的寫作經歷	(160)

唐至量	我也算作家	(162)
凌 鋒	今朝有稿今朝寫	(165)
曾敏之	走在人生崎嶇的路上	(168)
犁 青	任性亦韌性的追求	(171)
梁 楓	讓我回頭看	(174)
梁荔玲	我寫作的兩個階段	(177)
陶 然	闖入的房間	(180)
梅 子	窗外一片雨	(183)
梅 節	幾句自報家門的話	(186)
梅 蘭	從貓到老虎再到貓	(188)
梅創基	文字，畫以外的表達	(191)
雁 楓	徘徊在文學大堂門口	(194)
陳少華	這是一片流露真情之地	(197)
陳浩泉	總得登臺亮相	(200)
陳 娟	作家“夢”的實現	(203)
陳柏堅	遠望來時路	(206)
陳家春	老“匠”自叙	(209)
程乃珊	我的故事	(212)
雲利生	我圓了作家夢	(215)
張 伐	我是文販	(218)
張莉莉	一個多雨的季節	(221)
張振雄	往前看，不回首	(224)
張詩劍	八小時之外	(226)
張漢基	向着一個目標	(229)
張繼春	文學何價？人生何求？	(232)
黃虹堅	回家的感覺	(235)
黃坤堯	邊緣人語	(238)
黃珮玉	永不言悔	(241)
黃維樑	我與學術簽了永久的合約	(245)

黃傲雲	一土謳謳！兩手空空？	(248)
黃嫣梨	萬般皆下品 惟有讀書高	(251)
華 莎	追求的腳印	(254)
楊明顯	老蠹魚兒——文學與我	(259)
舒 非	我的故事	(262)
漢 聞	我走上爬格子的道路	(264)
趙美薇	繪出生活的浮雕	(267)
熊 達	但願不說假話	(271)
劉以鬯	自傳	(274)
劉樹華	我的道路	(277)
劉素儀	寫作邊緣人	(280)
劉濟昆	寫書追求左右逢源	(283)
潘亞暉	賞心樂事好尾景	(286)
潘銘榮	從惜墨到反環保	(289)
蔡敦祺	俺也來上場獻丑	(292)
駱賓路	走回頭路 吃回頭草	(294)
曉 帆	文商大海一片帆	(298)
謝雨凝	小傳	(301)
戴 平	空中的上帝	(304)
關夕芝	“燒包”	(307)
譚帝森	搶回一點喪失的時光	(310)
蘭 心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313)
羅慷慨	我在香港大學中文系的片段	(316)
羅 琅	生於憂患學自社會	(319)
顏純鈞	爲伊消得人憔悴	(323)

香港作家 110(代序)

陶 然

自從《香港作家》開設“本會會員點將臺”以來，在四年多的時間里，每個月便會有兩名作家的“面貌”圖文并茂地飄到我手上，於是，有幸認識的或未曾有機會認識的，熟悉的或者不大熟悉的，每個人的歷程，便玲瓏地在我面前展開。

作為這批自傳極可能是頭一個的讀者，我從中認識到多彩的人生，同時也給了我很多的啓發。應該說，閱讀一個人不容易，而這些自傳既提供了一個角度，讓讀者能夠切入，也提供了一把鑰匙，讓讀者可以登堂入室窺見“傳主”的内心世界，特別是內心的文學世界，以便可以更加理解其寫作道路和狀態；我以為這對於文學界同行來說，尤其不無積極意義。

由於每個人的生活經歷、修養、成就、想法等等都各有不相同，因此也就形成了萬花筒似的“衆生相”，琳琅滿目。在寫法上不求統一，各自自由發揮，以求都能展示個性，這也許是個不錯的主意；倘若個個都戴着腳鐐跳舞，舞姿即使美妙，也總會有過於“規範”之感。而寫作這個“行業”（如果在香港寫作也可以算是個行業的話）最忌千人一面，適當的自由度更可以讓作家在抒寫自己的時候如魚得水。

世事往往有失也有得，這種人人采用的“自由式”發揮，雖然在體例上可能會有不大整齊的感覺，卻可以讓讀者擁有更多的欣賞側面，得出更豐富更立體的感受；就像在燈光閃爍的舞場跳靈魂舞，各人隨着節拍隨心所欲地“流動”，不也方方面面地展現“人間風景”么？

當香港作家聯會的這 110 位作家聚集一堂，一齊在這本書亮相的時候，我們也可以欣賞到另一片“文學風景”。

當然，上臺者盡可自行決定如何演繹自己，臺下觀眾也自有權決定拍掌或者喝倒彩。除了各人偏愛不同之外，事實上，作者自說自話，分寸要拿捏得恰到好處，并不容易。只能說，小傳又不是照相，難以字字傳真，即便是相片，也難保沒有變形的時候，這只好歸咎於“遺

憾的藝術”了！

香港作聯已有 220 位會員作家，當第一批 110 位作家先排列好位置登場之際，我受命權充侍者，引領讀者諸君光臨臺前；而今幕布已經拉開，作家們自有話說，我也無須再饒舌，理應抽身而退了。

1995 年 3 月 30 日

我的文學道路

王一桃



我於一九三四年出生於馬來半島的東海岸。少年時代除了翻閱家中的藏書和從學校借來的兒童讀物外，還經常瀏覽當地兩大會館陳列的《南洋商報》、《星洲日報》、《中興日報》和《南僑日報》，并先后訂閱《馬來亞少年報》、《新兒童》等。我平素有剪輯報紙的習慣，幾乎各報的“學生園地”和其他文藝副刊我都一一加以剪輯。

從小學四年級起，我就開始向報刊投稿。其中刊登《星洲日報》的《丁加奴之夜》，可說是我的“處女作”。其他習作如《雨夜》、《瑛的日記》、《巴都勿洛游記》等習作也先后在《馬來亞少年報》、《中學生》等報刊上發表。由於小有名氣，我在班上被選為班委，負責主編《墾荒》；上了五年級，還被選為學生自治會的學藝股長，并主編《余甘》。課外還油印自寫自編的小報。

由於對文藝的酷愛，使我產生坐擁書城的奇想。十四歲那年，我開始借資辦起新南洋書店。現在回想，確有點神奇甚至感到不可思議。置身於書海中，我不僅讀魯迅、冰心、茅盾和巴金，而且讀巴爾扎克、屠格涅夫和高爾基……，通過以書會友和以文會友，我廣交文友筆友，互相切磋，共同進步。不料我這種極其正常的活動竟被當局取締，我因此被遣返到大陸。

走進中國的南大門，我反而獲得進一步深造的機會。在廣州的知

用中學、真光中學、培英中學的幾年中，我瘋狂地讀詩寫詩。令人感激的是我初中的語文老師林威先生破例地準許我用詩來作文，我高中的語文老師戴植秋先生和歐嘉年先生也給了我極大的鼓勵。而在圖書館任職的剛從東北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的李汝倫先生更對我的詩作提出寶貴意見。正是在這些良師益友的幫助下，我以《馬來亞獄中詩抄》走上華南詩壇，并受到詩歌界的好評。不久即和黃東平、犁青等合出《赤道綫上的歌唱》。

到桂林上大學的四年中間，正好碰上“反右”、“大躍進”、“反右傾”和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一連串的政治運動使我和繆斯逐漸疏遠。除了在《作品》刊登的長詩《新加坡啊！新加坡》、在《詩刊》發表《桂林·陽朔抒情》五首外，再沒有其他詩作問世。雖然我在這裡遇上林煥平、秦似、馮振、彭澤陶、賀祥麟、白曙等良師，并被委任《百花亭》、《疊彩》等編輯，但由於那段期間從未寫過一首“反右詩”或其他配合當時政治運動的詩作，因此在系的政治秘書和年級主任的心目中，我自然是屬於“思想右傾”、“只專不紅”的學生，加上我的海外和港澳關係，注定了我只有被改造的命運。在這種際遇下，我還有什麼心情去寫詩？詩神從此離我越來越遠了！

到大學中文系任教后，文藝氣氛稍好，我被校方任命為現代文學和寫作教研組的副組長兼校務委員會委員。於教學之余又動了詩興，發表在《人民日報》的敘事詩《娘惹》和《廣西文藝》的許多詩作就是這個時候產生的，我因此被中國作家協會廣西分會吸收入會，并任市文聯文學組副組長。但相對來說，文學研究和文藝隨筆這類配合教學研究和論文寫得比詩還要多，我開始感到邏輯思維漸漸取代形象思維。只可惜不久氣氛又反常，極左思潮占了上風，特別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登峰造極。這就苦了我們這些搞理論的人不得不違心去寫“遵命文學”，盡管文章寫得多如牛毛，但能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卻寥若晨星。而只要你的文章稍微一碰禁區，或講了真話，即被當作“沉渣泛起”，引起軒然大波！一九七二年我那篇文藝隨筆《不要硬搬和模仿》在一家省報被批判就是其中之一例。對於當時被挂起來賦閑在家的

茅盾在精神上給予我的支持和鼓舞，我將永世不會忘懷。

粉碎“四人幫”後，我轉到文化部門，在華應申、郭銘、陸地的指導下工作。在撥亂反正中我以個人或組織的名義寫了不少文章，發表在中央和地方的報刊上；並有機會上京和許多文藝家見面。我曾應南寧、桂林等地文化單位的邀請作《徹底批判“四人幫”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和禁錮政策，讓更多的優秀作品和讀者見面》的報告，就文藝問題提出了個人大膽的見解，由於其時天氣“乍暖還寒”，許多禁區尚未打破，因之招來許多非議。在擔任《廣西文藝》詩歌和理論編輯時，我除了寫這類文學評論外，還寫了《歸僑短笛》和《告別昨天》等組詩。

一九八〇初，我獲準赴港繼承遺產，但仍念念不忘文藝。《五十個文藝家之死》的連載和結集出版，本身就是一個例證。此稿於八十年代初連載，經“七年之癢”，直到八十年代末才正式出版。此外，我還寫了《中國作家印象》、《香港作家掠影》、《引你入門的書》、《和你共勉的話》、《為你示範之作》、《怎樣寫游記》、《中學生作文例話》、《不同天地見聞錄》等書。

如果說，過去極左思潮和“四人幫”肆虐文壇期間，我在內地是戴着镣铐跳舞的話，那麼今天我在香港這言論出版自由的社會則可自由自在地翩翩起舞了。但即使如此，我仍然忠於自己的良心，忠於自己的藝術，既不受這個主義那個思想、這個框框那個模式的束縛，也不淪為商業社會中精神鴉片的生產者和鼓吹者。沿着廣闊的現實主義道路走下去，這就是我今後的文學走向。

1990年中秋於香港



昨日

王 方

王方原名王智濃，筆名尚有譚天、蕭藍、東方亮、東方強、柯遼沙、柳爲眉、顏如平、祝天明、譚新之、周維暢等。廣東龍門人，一九三二年生於故鄉永漢鎮。童年、少年均在家鄉度過，小學和初中亦在此就讀。一九四七年到廣州聖心中學讀高中。一九五〇年考入華南人民文學藝術學院文學系，三年後畢業，被分配到大公報廣州辦事處任記者，次年調到香港，任大公報副刊編輯。一九五六年——轉到《新晚報》，任本地新聞版編輯。一九七五年曾在《東方日報》任編輯一年。從一九七六年起到《成報》任本地新聞版編輯迄今。《香港商報》、《新晚報》、《晶報》專欄作者。作品結集出版有兒童小說《夢游巴黎鐵塔》、《阿馬遜河歷險記》，長篇小說《迷霧》、《風雨同舟》、《天邊的彩虹》，中篇小說《電話情人》，隨筆集《香港生活的酸甜苦辣》。

我的夢魂，還常常繚繞在故鄉的山山水水，人人事事，舊居旁邊的那條石橋，橋下那條河，平常日子是清清淺淺的流水，不但游魚可數，連那半透明的小虹也看得清楚，可是，夏天一下大雨，山洪暴漲，那條小河就像一條狂暴的孽龍，那黃濁的河水，從上游奔流而下，浸過石橋，涌入我那舊居，連木板床也會給漂了起來，要躲上二樓去，有時水深達到那條沉重木樓梯的八九級。

雖然在十一年前，即一九七九年，我乘着改革的和風，回過一次

家鄉，那次距離告別它時已有廿多年，一切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連童年時代感覺得它也算宏偉的石橋，也變得渺小，殘舊。但這十一年來，我的歸夢依然是童年時代的那一切事物。

我出生在廣東東江地區的一個小鎮，距離廣州並不很遠，地名叫龍門縣永漢鎮。在我懂事的時候，抗日的烽火就已經燒近了我家鄉。我還記得，我初入小學時，由祖母帶着去距離老家后門不遠的小學，拜會校長，也拜聖人——孔夫子像。但日寇一來臨，一把火，燒掉了半個小鎮，都是最繁榮的中心地帶，包括我的老家與那間小學。

我的老家，是祖父開設的一間雜貨店，那是前鋪后居兩間相連的房子，后面的地方更大，有個後花園，種有柳橙、沙田柚、番石榴、木瓜等樹木，磚砌的花基上擺滿了盆花，還有個大金魚缸，養魚池，用來曬谷的大地塘，養豬的豬欄等。祖父的生意，除了經營雜貨外還做買賣谷米、屠宰豬只的生意。

正店燒了，日本侵略兵一走，我們從南昆山逃難回來，只好移居到河旁的分店去。我的童年與少年時代，就是在這間舊居度過的。

由小學到初中的一段時間，我都是在家鄉度過的。這時候哺育我成長的是章回小說，由三國演義、水滸傳、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七俠五義、小五義、粉妝樓等。直至讀初二時，有一對潮洲人夫婦來到我就讀的那間縣立二中，我才開始接觸新文學作品。這兩位老師，男的叫柯達，女的叫張彩亞。張彩亞老師教我們國文，例如《表》、《鐵木兒及其伙伴》就是由她介紹給我閱讀的。

初中畢業時，已經是抗戰勝利的第二年。叔父委托他的一個朋友，把我由家鄉帶到廣州升讀高中。那時的公路還沒有恢復通車，由家鄉去廣州，是經水路，乘木帆船，既利用風力，也要人力撐船，短短的路程，我記得要走好幾天。

當年我在廣州考進一間頗有名氣的中學讀高中，它就是設在石室旁邊的聖心中學。家鄉僻壤的初中，程度較差，我的文史地屬強科，英數理化則屬弱科。一讀高中，學校有圖書館，市內也有公立圖書館，這時我如饑似渴，閱讀新文學作品。可以這樣說，五四以來的新文學

作品，幾乎給我讀了七七八八。

由初中開始，我就喜歡作文，作文中有高達八十五分的。發展至後來，選讀文科，以及以半賣文為活，相信與此大有關係。在廣州生活了三年，時局起了很大的變化。解放軍南下，國民黨逃遁。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一聲隆然巨響，海珠橋毀了，我就睡在聖心中學的宿舍內，那些玻璃窗門隨着響聲而震裂，下墮。

我那顆年輕的心，隨着整個大時代而活躍，那時有一個強烈的願望，那就是到工農兵中去，到大時代的潮流中去，反映這個大時代。那時二野軍政大學在廣州招生，我考了進去，到二野軍政大學的駐地南海疊瀋鄉報到。

我們要從廣州經廣西，赴雲南，到達昆明，才是二野軍政大學的校址。疊瀋駐地的屋主是個中年寡婦，她見到我那七十多磅的瘦弱身體，要迢迢萬里的用兩條腿從廣東走至雲南，很為我的身體擔心，勸我不要去，就這樣，我偷偷離去了疊瀋，返回廣州，又回到聖心中學，繼續讀完了高中三的學業。

就在這個時候，歐陽山、陳殘雲、華嘉、杜埃、黃秋雲等一班作家，創辦了一家新型的大學，名為華南文學藝術學院。它設有文學系，還有戲劇、音樂、美術三個系。我欣喜若狂，馬上報名投考，以最高的分數獲得錄取。從此，我就開始踏進文學之門。

短短的三年時間，讀的雖然不算是正規大學的文科，但因為老師們個個都是名作家，文學作品接觸得多，在老師們的熏陶下，開始寫作，向報刊投稿，替出版社寫稿，后半生的道路，就這樣邁開了第一步。

大學畢業，被分配去做記者，記者生涯，編輯工作，與文學是那么不可分割。可以這樣說，從五十年代初期開始，直到現在，拿起了那枝文筆，一直就没有放下過。

四十年來，詩啦，散文啦，小說啦，我都寫過，而且繼續在寫。雖然說不上什么成就，但總算是走上文學之路。我相信，在今后的一段不太短的日子中，我仍會沿着這條文學道路，繼續走下去。

走過來的路

尚政



我出生於菲律賓，但三歲即回福建閩南家鄉，在父親身旁聽封神、水滸長大。以後讀過私塾，也進過教會辦的毓英小學和培元初中部。蘆溝橋事變第二年，我又隨全家避難遷居菲律賓，那時十四歲，轉學於岷尼拉南洋中學。在學生期間就喜歡在報紙上寫些時事評論。高中三年快將畢業，爆發了太平洋戰爭，可憐我這一生連一張高中文憑也沒拿到，便永遠告別了學校生活。三年淪陷戰爭，給我初嘗艱難人生的滋味，但也給我有時間閱讀不少俄羅斯經典作品；如托爾斯泰、杜斯妥夫斯基、屠格涅夫的和英法部份大家的著作；又在學習小提琴時候，接觸了貝多芬、柴可夫斯基、舒伯特這些外國古典音樂大師的作品。在我身上，既有人之初、性本善的熏陶，又接受托、杜型的人道主義影響；既承受家鄉南曲的哀怨深沉，又崇拜貝、柴的嚴謹、氣派。

一九四五年菲島光復，我在當地華僑游擊隊和地下組織的影響下，參加了當時成立的岷市文協，并被選為文協理事。那時因戰事而滯留在菲島有一大批國內進步作家，如杜埃、林林、梁上苑、南君等，當地成長的作家卓華、文炯等，我和他們一起於一九四五年到四八年這段時間搞了不少創作和文化活動，起過不少影響，導報、公報和商報副刊是我們活動的重要陣地。那時我還在戰後復刊的商報頭版擔任編譯工作，也參加了商報一些同人組織的聯誼活動。當時的聯誼社

在菲島華僑文化工作上也有相當影響的。我為什麼花這麼多筆墨寫這一段歷史，因是現在那些編寫菲島文化、文學史的人，囿於政見，大多從 50 年以後說起，故意刪除或有意回避這段歷史，真是和歷史老人開玩笑！

四八年底，我回來香港，邊參加學習，邊為大眾報寫些稿。四九年十月廈門解放後，我們一些人冒險通過當時風雲緊張的臺灣海峽回廈門去。出發前，我把一個新皮箱和在裡面放着的一份回境證交托親戚帶回菲律賓，而帶回國內的是一疊馬列書籍和整風文獻。當我們乘坐的船在海峽入口處被前面的英艦截停時，我們曾誤認是遇上了臺灣軍艦而差一點把書籍拋入大海，而與這同時，我托親戚帶回菲島的箱子連同我的回境證卻真的被有意地丟到大海或哪裏去了。這又給我上了一堂人生課。那些馬列書籍，印刷和紙張十分粗糙，但是那一時期我學習到的一點馬列思想、方法，卻給我受用了大半輩子——在一些人看來，可能說我被愚弄了大半輩子。我卻從未反悔過。我不是共產黨員，但我以為一個創作者不學點馬列，不懂得一點辯證法是頗足遺憾的。

從一九五〇年一月，我開始了長期的國內生活。我主編過《廈門青年》，當過工廠青年組織的小領導，一九五四年調到廈門市文聯，此後廿多年便一直在這個崗位上打轉轉。其中當然也經歷了許多運動、下放、體驗生活之類事。回憶起來，至今猶覺自豪的（從另外角度看也說得是傻瓜），便是五四年與五八年海峽兩岸空戰、炮戰的劇烈高潮中，我的兩個中秋節都在前線的壕溝里、在前沿觀音山的山洞里和老百姓同度。這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文藝工作者忠誠自我改造和深入生活的證據，盡管今天我們對於這個原則可以有這樣那樣不同的意見。還有值得一說的是，六九年舉家下放農村三年。文化大革命把好好一個中國搞得亂七八糟，其後遺症不說了。我倒是想說說個人意外收獲：這個強迫下放，使我對中國農民的勤勞、智慧和窮苦的命運有了更多得多的感性了解、體會，在這點上，我幾乎要感謝這次懲罰性的下放。